

■中华智慧集萃丛书

总主编  
冯天瑜 张艳国



人生箴言是人们从千年层累的人生思考以及满载经验与教训的人生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智慧结晶，它的文化本质在于人类渴望从理论上理解人生，渴望在自己的生存实践中把握人生，以至创造出自己理想中的人生。正因为如此，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箴言文化都有一个绵长的传统。

武汉大学出版社

郭莹  
编著

# 人生箴言



【中华智慧集萃丛书】总主编 冯天瑜 张艳国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箴言/郭莹编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0

中华智慧集萃丛书/冯天瑜 张艳国总主编

ISBN 978-7-307-05656-5

I. 人 …      II. 郭 …      III. 箴言—汇编—中国  
IV. H13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4154 号

责任编辑:陶洪蕴 责任校对:刘 欣 版式设计:詹锦玲

---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950×1260 1/32 印张:12.875 字数:365千字 插页:2

版次: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5656-5/H · 513 定价:20.00 元

---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总序

时代的步履已跨越 21 世纪的门槛，现代文明不断创造出辉煌成就，上天入地，呼风唤雨，世界统一市场建立、全息式信息迅速传递等昔日的遐想，都渐次演为活生生的现实。然而，现代化带来的并非单向式的进步，而是善恶并举、苦乐同行、创生与毁灭双至的“俱分进化”过程，正所谓：“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扬雄《太玄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诸层面，今人都患着不轻的“现代病”，面临着若干不易突破的困局。此间的人类尤需反思，神交古人，听取历史这位导师的谆谆教诲，借重昔时积淀的智慧。

作为人类智慧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智慧，不仅是中国人的财富，而且也为域外所借重：《易经》成为德人莱布尼茨创立二进位制数学的启示，而二进制正是电子计算机的运作原理；《老子》的“有生于无”哲言为西方建筑大师提供了灵感源泉；《三国演义》是日本企业家从事商战的教材；美军将帅在海湾战争中星夜披阅《孙子兵法》，“声东击西”是其赢

得胜算的谋略……外人研习中华智慧并取得实绩，使国人闻之而怦然心动——难道我们不应当以双倍的热情、更高的灵性，继承、发扬先辈智慧，以推动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创造新的业绩吗！

出于以上思考，本丛书试图介绍“中华智慧之集萃”，以为时贤提供参考。

何谓“智慧”？狭义的“智慧”约指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聪明、才智，与“贤德”相对称，故有“智性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分野。有些思想史家把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称之为“智性文化”，把中国文化称之为“德性文化”。这当然是从东西文化关注的侧重点之异而立论的，并非说希腊不讲德性，中国不讲智性。我以为，区分“智性之知”与“德性之知”确有必要，如果两相混淆，则知识论与道德论便混为一谈，然而，强作两分，把二者割裂开来，又有悖人类精神的整体性。本丛书所介绍的“智慧”，并不全然限于狭义智慧，而涉及广义智慧，或曰“大智慧”，包举才与德，兼容智与贤。如此议“智慧”，或许更切近中华文化的本真面貌：中华智慧不限于“智性之知”，还包含“德性之知”，追求二者的统一，偏执一面、陷入偏锋者则每遭诟病——多智而无德者（如曹操）被斥为“狡智”的“奸雄”；有德性追求却丧失智性者（如宋襄公）则被视为不足取的蠢才，这两类人都不是中华智慧的代表。中国人所推崇的文化英雄（如周公、姜子牙、诸葛亮）都是智者与贤人的整合，是仁、智、勇的统一体。从此种“大智慧”视角方可逼近中华智慧的真髓。

何谓“集萃”？本丛书并非论著的集成，而是编者从“中华智慧”涉及的各个侧面（如立身做人的德行准则、处世创业的韬略谋划、莘莘学子的学规、官吏奉守的箴言，乃至生态

平衡、家训要义、养生之道，等等），分别纂集中华古典的相关精粹，并加以条贯、诠释。读者诸君手持一卷，春诵夏弦，即可获得中华智慧某一方面的概要；若通览诸册，则可观照中华智慧的大貌。当然，如欲升堂入室，摘取智慧之果，则不仅需要“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因为大智慧的获得，是人生践履的结果，需要从知、行两方面潜心努力。编者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循流探源，寻觅中华智慧的真谛，并虚心汲取各种异域智慧，相互比较、彼此观摩，以求得在现代文明地基上的整合与涵化，达成中华智慧的创造性发挥。

冯天瑜

2007年金秋

书于丹桂飘香的武昌珞珈山

## 前 言 人生箴言与中国传统文化

自从人猿揖别，开始了文化的历史，人生的思考便成为人类意识活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在纷至沓来、无法解脱的种种人生问题中，人应该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不同的致思趋向，引发出千姿百态的文化行为，进而激起经久不衰的历史涟漪。

在溯源久远、绵长不绝的人生思考与人生实践活动中，关于人生之道的人生箴言应运而生。

一般而言，箴言具有三个特点：

(1) 形制短小，呈片语式。在英文中 *aphorism* (箴言) 的含义便是 *short, wise saying* (短小、智慧的格言)。

(2) 高度凝聚生活智慧。明人吴从先在《小窗自纪》中曾阐明箴言这一特质说：“冷语、隽语、韵语，即片语亦重九鼎。”

(3) 含有警示性。中国古代释“箴”者，“谏也”、“诫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

也”<sup>[1]</sup>。释箴言为“箴谏之言”正基于此。

人生箴言是箴言的一大分支，其基本特点自然概莫能外。

以“箴谏”为特质的人生箴言，在表现形式上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

——警句的、逆说的、片面的、讽刺的、暗示的。

——平叙的、直说的、全面的、说服的、明说的。

以同为揭示人性弱点的箴言为例，“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属于前者，“好谀是人生大病”属于后者。前者出人意料，寸铁伤人；后者平易从容，但意味绵长。

箴言还往往把两个相关的短句并列对照，以取得警示人生的功效。例如，法国拉罗什富科《箴言录》中的名句：“我们总是喜欢赞赏我们的人，我们从来不喜欢我们所赞赏的人。”中国传统箴言库中，此类例子更多，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读来令人顿生憬悟之心。

人生箴言是人们从千年层累的人生思考以及满载经验与教训的人生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智慧结晶体，它的文化本质在于人类渴望从理论上理解人生，渴望在自己的生存实践中把握人生，以至创造出自己理想中的人生。正因为如此，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箴言文化都有一个绵长的传统。

诞生于公元前1200~前100年期间的希伯来正典《旧约全书》有一卷名为《箴言》。

古埃及有一部流传甚为广远的《阿穆勒莫比智训》。

古罗马著名诗人卡图卢斯开创“警句诗”这一范型。其脉流源源不绝至今，蒙田、歌德、王尔德、萧伯纳均在“警

[1] 《文心雕龙·铭箴》。

句诗”创作上有杰出成绩。17世纪后半期的拉罗什富科则以《箴言录》一书将法国的警句诗推向了高峰。

中国亦有渊源久长的箴言传统。

《尚书·盘庚上》中，盘庚向官员训话：“惄民犹胥顾于箴言”（小民尚且顾及规劝的话），这大约是“箴言”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最早出现。

《诗》、《书》、《礼》、《易》、《春秋》，是儒家“五经”，其中可警示人生的箴言丰富叠出，先秦诸子著作，如《论语》、《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哲言名句亦俯拾即是。秦汉以后，箴言文化绵绵不绝中有两大高潮，其一为唐宋时期：唐代出现了以俗语记录高僧谈话的禅家语录，宋儒起而效仿，亦以语录形式表述人生观念与学术思想，箴言形式的作品因而大量产生。其二为明清之际，这一时期天崩地坼，士人思想敏锐活跃，他们不拘绳墨、直抒性灵，以简易率直的方式昭示他们的处世训、人生训，箴言（清言）热潮蔚然兴起。著名的《菜根谭》、《呻吟语》便是这一热潮中应运而生的人生箴言专书。以唐宋人生箴言与明末清初人生箴言相比较，前者“思虑深沉”，正襟危坐，富于大家风范，后者饱含机趣与冷隽，具有山人隐士不衫不履的风格。两大不同的箴言文化走向，既是那一时代文化性格的生动映现，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人生箴言库。

就外在形式而言，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人生箴言都呈现为一种散在性、片断性，但就文化特质的相通性而言，人生箴言实质上是一个风格独具的文化系统。在结构上，它至少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什么是人生？什么是生命？如何对待现实的人生？这是人生之道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人生箴言作为一个文化系统的

逻辑起点。

——人生是一个一次性流程，这一流程又可分为儿童、青少年、中年、老年四大阶段，人应当如何把握“人生大化”<sup>[1]</sup>不同阶段的“黄金核心”，这一问题直接关系生命张力的充分舒展。

——人的一生，自始至终为形形色色的人生问题所困扰，如生死、得失、荣辱、义利、苦乐，如何在两难之中作出抉择，不仅对人的一生有深刻影响<sup>[2]</sup>，而且也最能体现不同民族的人生价值取向。

——人生在世，必然要同周围的人接触和往来，建立起一定的社会联系，而在这种社会联系中，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自我以及如何对待他人的大问题，这就是“处己”、“待人”。从古到今，人们都普遍地关注这一问题，并总结出包括主导思想与行为方式在内的充分的经验和教训。

——家庭是人生道路上的憩息地。稳定的家庭生活对人的一生有重要的影响，关于家庭与人生的箴言在人生箴言大系统中自有一定的地位。

——人的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有死方有生，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人生的多姿多彩总是吸引人们追求健身长寿。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到东方中国，都在养生问题上多有警示之句，从而构成人生箴言的一大内容。

——人的一生，苦难殊多，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去追求一种

[1] 《列子·天瑞》：“人自生至终，大化有四。”即人一生中从婴幼儿到老年的造化迁流。

[2] 《意气谱——反菜根谭》：“一生有万念，而足定生平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足证终生功愆者，数事而已。”可见中国古代对人生选择的重要性已有充分重视。

审美感悟，使再苦涩的生活也变得自有情趣，这是人生旅途也是人生箴言中十分重要的课题。

人生箴言不仅在结构上具有系统的意味，而且在文化性格上拥有两大特征：

### 一、文化的整体性

前苏联文化史家M. C. 卡冈在《文化系统中的艺术》一文中对文化的整体性有一段精辟的议论。他指出：“文化的特征是它的各种成分之间的组织性、系统联系。换言之，文化永远是某种整体，它的所有部分——子系统、方面、水准、成分——处在相互作用、互为中介、相互反映的状态中。……阶级对抗极大地损害了民族文化的能力，致使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实际上归于泯灭，不过，某种民族文化所分成的每一种都具有内在完整性，它按照创造文化的社会力量——一方是民主大众，另一方是贵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根据生活方式、意识结构、利益和理想形成每种统一整体的程度，显示出这种完整性。”<sup>[1]</sup> M. C. 卡冈所强调的文化完整性“不是被抽象看待的文化的抽象属性”，而是来自其共同的物质基础，“是对创造文化的具体主张的关系中加以考察的具体文化构成物的属性”。它所表现的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

以文化整体观考察人生箴言，势必把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人生之道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和叙述。把构成中国人人生之道的各种人生箴言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和描述，由此而来，它必须回避如下两个误区：

[1] 《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360~361页。

第一，重人生哲学的研究而忽视经验性的行为准则。

作为警示人生、指导人生的人生箴言，在结构上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理论形态的关于人生目的、价值和意义的规范体系，亦即人们所熟悉的“人生哲学”。一是具有操作性的指导日常行为的经验性准则，亦即“人生技巧”或“生活技巧”。“人生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理解和把握人生的真谛，即一般规律”<sup>[1]</sup>，具有鲜明的形而上色彩。人生技巧则通过经验性的行为准则对人生哲学加以具体操作，从而更偏重于实践性。由于生活中的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也不会醉心于人生的哲学思考，他们口口相传的多为关于生活技巧的经验性准则，因此，在传统人生箴言中，具有操作性的指导日常行为的经验性准则，实际上占有相当分量。然而，以往的同类研究，更多地关注文化精英人物关于人生的哲学思考，而忽略了人生箴言中有关人生技巧的丰富内容，这就很难使人得窥中国人人生之道的全貌。

第二，重文化精英人物的箴言整理而忽视民间大众的俗语。

任何文化系统，总是包容着雅与俗的分野。传统人生箴言也概莫能外，它理所当然地既包含孔子、老子、庄子、墨子一类文化精英人物关于人生之道的精辟哲言，也包含民间大众关于人生之道的鲜活警句。然而，与前述研究误区一脉相承，以往的有关研究以典籍文化为重心，以清理文化精英人物的人生价值理想和伦理观念为主要任务，而乏于对民间大众中流行的人生格言加以必要的整理和注意。这种研究的理论误区在于过

---

[1] 张文彦主编：《人生哲学概论》，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 页。

于夸大文化精英人物在文化系统中的角色与作用，忽略了官方价值观与民间价值观的貌合神离以及“典籍文化价值系统与民间实际奉行的人生之道之间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赖，既互相渗透又互相疏离的复杂关系”<sup>[1]</sup>。诚然，圣贤关于人生之道的哲言对于中国人的人生之道具有典范的、权威性的价值导向，但是，它的辐射力总归具有相对的时空限度，而广大芸芸众生在活生生的生活中有自己的价值选择，有自己的生存技巧，其关于人生的议论有许多精英文化鞭长莫及之处。只有视野广阔地将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箴言纳入视野，将它们与圣贤哲言放在同一背景中，当作共生互补的整体来看待，方能真切揭示中国传统人生箴言的整体性面貌。

## 二、独特的民族性

文化整体性的含义不仅意味着传统人生箴言在内部结构上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意味着同一生存背景中的人们，尽管在人生的价值选择上存在着种种个体上的差异，但其形、相纷呈的人生箴言的深层必然存在着某种内在共性，对于它的文化系统来说，这种共性即民族文化个性。

就中国传统人生箴言而言，其文化性格十分鲜明。农业民族的务实精神，使中国传统人生箴言的方向直指人的现实生活，其中心目标是教给人们如何在现实环境中活下去，并且活得舒服自在。如在人生态度上，中国传统人生箴言中固然不乏“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一类的哲言，但更为流行的还是“忍气饶人祸自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常乐”这

[1] 曾凡：《中国人的人生之道》，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样的警示性教诲。这些箴言固然色调黯淡、压抑，但却是一种鼓励人们竭力适应环境、坚韧生活下去的人生哲学。再如，中国传统人生箴言在揭示生死必然性的同时，着意向人们强调，既然“人生只百年，此身难再得”，那么，人就应当用现实的态度对待现实人生，“得快活，且快活”，“好死不如恶活”。这种伴随终生的人生教诲灌输给中国人的也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求生意识，一种极端现实的人生态度。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性特质也在人生箴言中打下了深刻烙印，例如，在处己问题上，强调“为己”而非“为人”<sup>[1]</sup>；在待人问题上，强调宽厚辞让而排斥个性表现与积极竞争；在义利问题上，强调正义明道而轻视利益、蔑视事功；在家庭关系上，高度注重以纲常为纽带的家庭的稳定性。和其他民族的有关人生箴言比较起来，其文化个性甚为突出。此外，中国传统人生箴言以宁静、恬淡、肃恭、圆浑、朴素和心灵的扩展为特色，而不像西方人生箴言那样，具有一种以利刃剔抉剖析人生的尖锐性，这种风格上的差异，显然也是以民族性格的不同为前提的。

在关于传统人生箴言的讨论中，还有一种思维方式必须加以克服，这就是对传统人生箴言作“非精华即糟粕”的绝对化的价值判断。文化价值学说表明，文化一旦以传统形式积淀下来，便包含有超时空的普遍合理性因素。这种因素或隐蔽于众多杂芜中，或在价值实现上具有因时、因环境转移的非确定性。传统人生箴言因此在价值取向上隐含着若干价值悖论。一方面，这些箴言以血缘宗法的社会存在为基础，表达了适应这

[1] 此处所说的“为己”指的是注重自我修养，“为人”指的是着意表现给他人看。如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求诸己，小人之学求诸人。”和后起的“为己”（自私），“为人”（利人）的含义不同。

一个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特殊的，消极的）；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人生之道的经验概括，传统人生箴言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基本生活原则（普遍的，积极的）。而这样一种两重性往往同时蕴涵在同一则人生箴言中。例如，“和为贵”的教诲，既包含有轻视竞争意识的价值取向，又在实践中具有推动人际关系和谐的积极功用；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中以“忍”为主题的箴言，既意味着消极的自损、自抑以及随之而来的个性人格的沉沦，又包含了人类自我克制的高度理性精神以及屈而后伸、弘毅致远的坚韧意志。“知足常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箴言也同样如此，一方面，它有力地促成了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它教会人们正视环境、承认环境的限制，从而在艰苦的物质条件或精神氛围中乐观坚韧地生活下去。此处值得一提的两篇文学作品，一篇是余华创作的《活着》<sup>[1]</sup>，一篇是周大新的《无疾而终》<sup>[2]</sup>。《活着》中的主人公一生经历了无数超出常人所能忍受的人生苦难，读来令人触目惊心、潸然泪下，然而，这位主人公“忍”了下来，与陪伴他的“一头和他几乎一样老的老牛”，“竟能活到现在，活这么久”，这样一种人生道路充分体现了普通中国人历经苦难而不沮丧的坚韧的人生精神，具有深沉的文化内涵。周大新的《无疾而终》写了一位瞎爷。瞎爷的生存技巧便是在一生所有重大问题上都采取“知足常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生态度，例如，瞎爷9岁时左眼因高烧失明，爹娘大哭不止，年幼的瞎爷却说：“哭啥？应该笑才对！这场病不是才弄坏了我一只眼？总比世上那些双眼全

[1] 见《收获》1992年第6期。

[2] 见《山东文学》1993年第4期。

瞎的人不是强得多？”爹娘初听一惊，后想想也在理，遂止住了眼泪。瞎爷读私塾不久，便因领悟力太强，把富家孩子比了下去，而被中止读书。爹娘叹息自家穷，无本事，瞎爷却说：“我已经读了一年书，总比那些一天书没念、一个字不识的孩子强吧？”爹娘听了，觉得也是，便不再自怨自艾，心情恢复如初。到了娶媳妇的年龄，瞎爷因瞎了一只眼，只能娶一个先天豁的姑娘入门，爹娘连连叹息和摇头。瞎爷反来劝爹娘，“能娶到一个媳妇就不错了，和世上那么多光棍汉比比，咱还不是好到了天上？”爹娘一听有理，遂放下那份后悔和歉疚，高高兴兴地做起公公婆婆来。以后，在处理婆媳关系上，在生男生女问题上，在处理儿女亲事问题上，乃至自己后事的安排上，瞎爷都秉承“知足常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生宗旨，从而无疾而终，“死时面孔安详，两个眼角还有笑容留着”。在艰苦、困窘的生活环境中，在不幸遭际接二连三袭来的情况下，假如瞎爷不是采取“知足常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生态度来平衡自我心理，坚定生活下去的信心，而是成天自怨自艾，怨天尤人，其人生绝对只能是一场悲剧。由此可见，“知足常乐”一类的人生箴言虽然缺乏积极奋进精神，但确乎蕴藏着特定的生活哲理，具有合理的文化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跨入近代以来，人们的人生观念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 20 年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深入推进，中国人的人生之道更呈现一种新的格局。但是，现实与传统的联系是无法割断的，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方法、生存方式和价值判断，虽然在融摄变革中发生更新，但也具有其较难被抹煞的“文化原型”。对传统人生箴言的研究，不仅将使我们通过前人关于人生的警示之言加深对传统的理解

和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在当今不断变迁的心理历程中捕捉不太容易变化的“心理原型”，考察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支配了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乃至细琐的文化行为，在当前文化重建的宏大工程中，这一工作无疑具有它的特殊意味。

当然，对传统人生箴言的研究还有另一层意义，这就是从前人关于人生的警示之言中提取醇醪，以完善自我人生，而这一转化过程，必须充分运用个人的智慧，否则，即使“积贮了再多再丰富的箴言隽语”也无济于事。此处倒用得上法国当代思想家柏斯卡尔的一句话：

一切良好的格言，世界上都有了，只是有待我们加以应用。

权以这一警句作为本篇序言的结尾。